

全。不料苏军进驻长春，将于逮捕，带到苏联。在苏联伯力俘虏营住了将近5年，于1950年夏由苏联遣返中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待罪反省。于1962年特赦回长春。（下略）

（摘自《长春文史资料》）

伪满司法部大臣张焕相

张辅麟

一、他被捧为“敬神家”

1940年5月，傀儡皇帝溥仪奉当时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之命，第二次去日本访问，专门把天照大神“请”回来，当作伪满的“建国神”供奉在新修的“建国神庙”里，并称日本为父母之国的“亲邦”，不折不扣地当了儿皇帝。此后，敬神之风风靡一时。在此风中有一人大出风头，他就是伪司法部大臣张焕相。因为早在1937年，张焕相带头，首先在抚顺修了神社，被日伪当局尊为“敬神家”而名噪一时。其实他所搞的那一套，只不过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导演的一场改换祖宗丑戏中的开台锣鼓罢了。

1937年8月，张焕相决定在自己家乡抚顺新屯南山动工修建日本神社。他自己掏腰包花了伪币4500元，还由伪县长及县里各有关人士组成“氏子委员会”，筹划修建事宜。费时两个月，修成后供奉日本神武天皇，专门搞了一个镇座祭，邀请伪满军政要人前去参加，还组织小学生每人栽一棵树以作纪念。当时《满洲日日新闻》拍照报道大肆宣传，颂扬张焕相的“敬神”美

德，着实风光了一阵子。张焕相自此也以“敬神家”自居，每年都坚持进行两次祭祷，特别是春天要进行大祭；不仅张焕相携家带口特意从“新京”赶回抚顺，还要邀请伪满军政要人前往参加。1939年春天大祭时，伪满中央去了50余个要员，其中有伪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伪协和会中央本部总务部长皆川丰治等人。抚顺当地官员也有50余人，另外又组织百余名小学生参加祭典，很是隆重热闹。祭后，张焕相还设酒宴招待。1940年以后，修神社、拜神像的邪风在伪满越刮越甚，张焕相作为“敬神家”自然不敢怠慢，时时处处表现他对日本神的虔诚；每天早上在自家平台向东方——日本皇宫方向遥拜；每周日带领家人去忠灵塔祭拜，同时还要扫台阶；每月一日必到“新京”日本神社参拜，在神官的陪同下，向神像献玉串。他还现身说法，到处替日本人做宣传，宣讲“唯神之道”，尤其是去伪军和各有关系学校大讲自己为什么信仰“唯神之道”，并大论特论日满一德一心与“唯神之道”的关系。一时间成了讲神布道的大忙人。

张焕相为什么带头修神社呢？这里包藏着张焕相的野心和一个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的故事。

“九·一八”事变前的1925年左右，张焕相在任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时，从哈尔滨旧物摊上买了一个约有2尺高的铜质神像，当古玩摆设欣赏。伪满时，有人告诉他这是日本开国的神武天皇像，顿时把他吓坏了，亵渎了日本人的老祖宗还了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等冷静下来，新的念头产生了，决定盖庙供奉。他立即请当时司法部次长古田正武陪他去老家抚顺新屯选址修神社。古田去了看后认为，南山地势好，山清水秀和日本的风景一样。张焕相马上把南山地买了下来。开始时他张罗修神庙，古田提醒他只有神像并无神体，只能修神社，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场面。由此可见，张焕相确有善于变被动为主

动的投机性。这种投机性在以后还有恶性发展。张焕相自恃在“敬神”上抢了先，有了发言权，于是到处宣传说：“我认为我与日本祖神有缘，在家乡修神社奉祀神灵，不仅可以借此表示崇敬之意，也能做为家乡人民敬神拜神的中心。我还想最好能在长白山上修一个大神庙，供奉日本祖神，这样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供人民敬仰，又能借神灵保佑国泰民安，而日满一体精神更可借此大大显现。”长白山是传说中的满清爱新觉罗祖先的发祥地，张焕相竟然主张要把日本神社修到那里去，真是投机投到了顶，献媚献到了家，无怪乎曾任伪司法部次长的日寇前野茂说：“张大臣修神社是带头实行日满一体的集中表现，真是了不起！我在司法部时，每周都请我们喝酒恳谈，像一家人一样，那个人太好了！”

二、他想跻身伪满政坛身居高位，却迟迟未能如愿

了解张焕相历史的人都知道，他在东北军政界中颇有资历，是个元老人物。早在1926年就被授予中将军衔，“九·一八”事变时任东北航空军司令部副司令，代行司令职务（正司令由张学良兼），与张作相、张景惠平枢，时人评论张学良是使“三张”权力均等。由此可见张焕相当时之地位，故张焕相本人平时亦自视甚高，孤傲得不得了。然而他在“满洲国”却一反常态，在媚日卖国的路上走得这么远，很使一些人迷惑不解。殊不知这位久经宦海沉浮的老政客，有很强烈的权势欲，为要达到当大官的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在这方面他也有一段不平常的经历。

“九·一八”事变时张焕相不在东北，早在10天前，即9月8日他作为东北航空副司令，会同兵工厂总办米春霖陪着捷克工厂代表一起去北平见张学良，面商领款、设厂和购买飞机等

事。所以，当“九·一八”事变后，他自然滞留在北平，临时担任张学良的参谋长兼秘书长，着重抓东北航空司令部来北平人员收容安置工作。不久热河失陷，迫于国内舆论压力，张学良戴罪出国考察，东北军人心浮动。蒋介石派中央航空司令毛邦初来北平接收，将东北航空军的技术人员、工人和驾驶员一律并入杭州中央航校，其余人员全都拨入差遣队，发六成工资维持生活。张焕相这位司令官被蒋介石委为中央军事委员，他却认为空头委员没有什么意思，感到宦途迷茫，遂去天津进行活动，亦无结果。张焕相自认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又不愿当寓公，遂下决心返回已沦陷的东北。

东北，作为张焕相的家乡和为官活动的舞台，对他还是颇有吸引力的。一是在抚顺老家，他有自己活动的天地，根子扎得较深。他家世居抚顺县营盘新屯，其父为恶霸地主，不仅拥有千顷土地，还善于耍弄权谋，包揽诉讼，欺压佃户，鱼肉乡里，横行无忌，人称“张二朝廷”。虽然其父已经死了，但余威仍在，尚留下土地700余顷，供其食用，生活来源可谓丰厚。二是在北满更有他官场周旋的得意之举，至今回想仍使他津津乐道。那是在他任哈长护路司令兼第十九旅旅长时的事情：他与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因利害相关结拜为兄弟，彼此勾结，利用东铁运输的方便条件，经营粮食买卖，大发横财，除给张作霖一部分以掩耳目外，所余大半由他与吴督军平分，撻了一大把；还有一件得意之举，张作霖想撵走吉林督军孟恩远，他就利用自己身边的大尉参谋土肥原贤二负责联络驻长春日本守备队，协助黑龙江驻军赶走了孟，为此，张作霖让他任滨江镇守使兼护路军代理总司令之职，一时在哈尔滨成了声名显赫、炙手可热的人物。张焕相为庆贺自己得子办满月时，各界人士纷纷前来礼贺，所送金银手饰竟达300余两。三是在长春的伪国都“执政

府”内，虽已有溥仪就位执政，并非终身制，他自感凭往昔在东北的身价，也还有竞争入选“执政”的实力与机会……就这样，在张焕相以自我为中心的算盘里，被在老家时作威作福生活的吸引，在北满为官的荣耀，现今“执政”位置的诱惑，这三颗珠子打出了他最如意的算盘，促使张焕相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举动。他于1933年6月携带家眷经天津乘船返抵大连，自动投入日本人的怀抱。

在这里，我们还要补叙张焕相的一件往事。那就是他和他父亲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就与日本有勾结。当时日本陆军第十一师团长蛟岛重雄驻兵在抚顺萨尔浒村，与张家的营盘村以浑河为界，南北相对。张父帮助蛟岛办过给养，修了浑河桥，为军事行动提供了方便。在举行通车仪式时，张焕相当场作诗吟颂日军战功，颇得蛟岛赞许，并答应帮助张焕相去日本留学。蛟岛说，由他负责向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推荐，如果不行，他再求儿玉参谋长。此事果然得到了赵总督的应允。张焕相如愿以偿去了东京，先入振武学校，1908年以留日士官候补生的资格，入近卫师团第二联队第二大队受训，1909年入陆军士官学校。这期间，张焕相之父因鱼肉乡里，惹起众怒，加上地方两派倾轧，被另一派抓住把柄予以告发，押于狱中，又是张焕相远在东京通过蛟岛的帮助，促使当时日本驻清朝使馆出面干预，终于解了父难。为感谢蛟岛重雄，他在任护路司令期间，托人捎去珍贵的白熊皮，蛟岛按日本皇道派军人习惯回赠给他日本古刀一柄。与日本陆军界老资格人物有这么悠长而又深厚的交往历史，使张焕相更加相信回东北会得到关东军的厚待，有一个美好的前景在等待他，因此他真有点“义无反顾”了。

张焕相的为人一向刚愎自用，总是过高估计客观形势和自我身价。他认为凭自己过去与蛟岛交往的历史，在东北拥有的

声望，又是“陆士”出身，还有熟人土肥原，此番主动回归东北不倍受礼遇才怪呢！所以，他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上船就走。哪知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东北是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满洲”，过去的老皇历都看不得了。张焕相哪里知道这个，在船上大模大样地给司法总长冯涵清发出一封电报，让他告诉郑孝胥，说张焕相返归故里。哪知船到大连港，就有便衣宪兵上船询问，并声言日本宪兵队长要召见，要求他在大连滞留三天。张焕相刚抵东北，不知道日本宪兵的厉害，竟然置之不理，不但未赴大连宪兵队长之约，更径直带领家眷直奔沈阳。结果惹恼了宪兵，不但一直跟到沈阳，下车后不容分说，立即“送”到大东门外宪兵分队部，扣押六天，最后宪兵分队长增田告诉他要想回抚顺老家，必须取得日本关东军的同意，否则他只能呆在这里。到此，张焕相才开始尝到日本关东军的厉害滋味，只好给小矶参谋长打电报道歉。傍晚，增田通知他要立即去当时的“新京”，又是在宪兵的监护下，连夜乘车来到现在的长春。当晚没人理睬，第二天在宪兵司令部又白等了一天，第三天宪兵才告诉他要进行军法会审，这太让张焕相感到难堪了，他只好一再辩解说自己不是被俘的军官，也不是叛官，在北平又没做啥，没有什么理由进行军法会审。宪兵对于他的声言既不反驳，也不答复，僵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在宪兵监护下来到伪军政部，由次长王静修出面接待，王静修也很不客气，公事公办地向他宣布：军法会审不搞了，但必须在誓约书上签字。这誓约书是事先印好的，文字不多，只有两条，第一条是誓为“满洲国”民，忠于“满洲国”，遵守“满洲国”的一切法令；第二条是个人一切财产都要开单呈报，任凭“满洲国”处理。条件虽然不多，但也使张焕相感到好似在降书上签字一样，一时有点却不下脸面来。王静修似乎看透了他的为难心境，马上又

解释说，这誓约书不是专给你签的，凡是回“满洲国”的官吏都需办这一手续，邢士廉等人回来也都是签了字的。张焕相没办法，只好老老实实地在誓约书上签了字。这时形影不离监护他的宪兵才撤走，他得以有自由回老家抚顺。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原先张焕相自以为不驯服、有棱角，现在那点棱角被日本人磨平了。他开始在老家——抚顺县新屯过起地主的闲居生活，莳弄莳弄菜园，养养蜂，栽栽果树，表现出一种悠然自在的情趣。但他不忘抖地主的威风，为了少几块木板，张焕相竟逼得木匠刘聘富上吊自杀；看家护院的炮手张恒有不慎丢了一支枪，张焕相勾结县警察署又上大挂，又灌凉水，一次就灌了三担水，外加棍棒拷打，弄得奄奄一息，险些丧了性命，与此相反，他对县上日伪军政人员则百般照顾极力联络感情。他曾在家中两次设宴招待驻抚顺日本守备队长相原少佐，还送给驻清原守备队长中岛大尉以宝贵的莹石礼物。宣抚班来时，更是好烟好酒招待。一时间，成了新屯的中心人物，人们私下说，“张二朝廷”的威风又开始抖擻起来了。这话不假，张焕相表面上摆出“务农”的架式，实际上却在为自己出世制造相应的气氛。这位久经官场的老政客怎能自甘寂寞呢！气氛达到了一定程度，他就开始寻找机会四处活动了，也就在回乡数月后，1933年秋天，他借送孩子看病为由，去沈阳拜会了老熟人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探听了一下口风，并没有得到具体承诺。1934年3月，伪满实行帝制时，张焕相曾给当时伪民政部总长、帝制庆典筹备委员会的臧式毅打电报，表示他要在皇帝举行登极大典时率抚顺绅民70余人前去庆贺，因臧未予答复，此举未能成行。1936年10月，他又去沈阳找伪奉天市长王庆璋，提出想要认识一下奉天守备队长园部和一郎中将与特务机关长三浦敏事少将。王庆璋答应了他的要求，设宴请了这两

个人，同时还找了伪第一军管区司令于琛激、教导队长邢士廉、伪奉天省长葆康等人作陪，特别把张焕相介绍给园部和与三浦，彼此说了些联络感情的话，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不过，经过这样几次活动，已完全透出他不甘寂寞想要出世从政的强烈愿望。这一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已反映给日伪最高当局，张焕相在静等回音。不久，回音果然来了。1936年5、6月间，伪宫内府侍从武官金卓因事路过抚顺营盘，专门去看望了张焕相，谈话中言及溥仪等有起用他当军政大臣之意。张焕相当即讨价还价地说：“军队讲阶级服从，我过去是中将，现在要当军政大臣得须是满洲国陆军上将资格。更要让我掌实权，不然的话，像拿着半截军刀一样，能当什么用！”金卓听后没说什么，走了，以后再没有信息，也许是张焕相要价太高，溥仪做不了主，也许是日本人嫌张太狂妄，竟敢和日本人争实权……总之再无人提起，就这么擢了下来。1936年秋天，伪总理大臣张景惠因视察地方情事，车经营盘车站，邀请张焕相前去愚谈，张焕相去了向张景惠正式表示了自己想从政为官的愿望。张景惠也当下表示欢迎他从政，只是需要回去议定后给张来信。二人约定接信后，张焕相就去“新京”。张焕相耐性等待，12月6日张景惠来信了，事到临头，张焕相还忸怩作态一番，一是假装清高，二是张景惠信中没有说明安排什么职务，他心中不太有底。他表演一下后，终于还是去了“新京”。张景惠专门在伪中央银行俱乐部设宴为张焕相接风，同时将张焕相介绍给主管“满洲国”事务的关键人物关东军第四课长黑川少佐，并宣布任命他为国务院简任嘱托。自此，张焕相正式步入伪满政治舞台。他行韬晦之计为准备出世进行的活动，前后历时三年，这中间除了他个人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各种机会表露自己意向外，曾任关东军司令官的南次郎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南次郎认为张焕相是东北的

遗贤，非常欣赏张焕相任护路军司令兼特区长官时在哈尔滨修文庙的举动，认为这是他反对苏联赤化的最好办法，主张早些找张焕相出来为“满洲国”做事，曾催促过几次，最后终于落实了。

三、他为显露“才能”三次向关东军献计策

然而这个简任嘱托的安排，对于一向看重官阶的张焕相来说，实在是低了些。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他不再采取“硬”的方式，公开要价，而是采取“软”的方式，这就是抓住一切可以表现的机会，积极向日本人献计献策，这样既可以讨好关东军，又能从中显示他的政治才能，为进一步升高官阶打下基础。

他又开始像回抚顺老家那样行韬晦之计，等待机会了。很快机会就来了，1937年2月，张焕相被任嘱托刚一个月就有了一桩差事：陪同伪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去东边道一带视察了解“归屯并户”情况。回来后，他立即向佐佐木提了7条建议，具体内容为：

一、由辑安通北朝鲜修建江桥，以便利满洲与朝鲜间进行人和物的交流，打破鸭绿江的界限。

二、在归屯中，难民自有土地者，可以帮助安家集居，加强防卫力量，以防匪患；无土地者，或愿往吉、江两省开垦者，可以资助旅费和安家费，拨给荒地，集中居住；东边一带剩余土地给北鲜人耕种，与本国人一样担负捐税，北鲜人余下土地可由无地日本人耕种。如此移民在天时、地利、习惯及认识上不致有大的差别改变，较为适当。

三、东边一带矿产丰富，山林产品亦多，应极力开采，对于林产应注意经营。

四、加强警察实力，掌握人民动态，保持地方治安。

五、整顿交通，通畅各县公路，尤其是山间公路。

六、通化为东边道重要地点，应建省公署。

七、在通化城多驻兵力，以镇匪患，以安人心。

佐佐木到一看了这份建议书，感到很有份量，这位特务出身的“中国通”，是时正操持伪满军事大权，通化东边道一带当时正是东北抗联杨靖宇将军率领的第一路军进行抗日游击活动的重要根据地。抗联一路军将士的骁勇善战，很使关东军头疼，称该地区为“满洲治安之癌”。张焕相陪佐佐木巡视“归屯并户”，就是实行所谓“匪民分离”政策的最毒辣的一手，他犹感不足，又补充提了7条，为日伪当局如何讨伐围剿抗联出谋献策，其中如建议加强警察实力，就很被欣赏，以后关东军在东边道地区特别组织了程斌、唐振东、崔志武等警察大队，对抗联进行围剿。1940年杨靖宇将军所率小分队最后就是被崔志武警察大队抵进队给打散的。同时，他的建议也使日本人更明确了东边道地区在伪满的重要地位——物产丰富，地势险要——不但以后设了通化省，更把通化作为他们最后固守的防线和反攻的基地。总之，通过这次建议，军阀官僚出身的张焕相显露了他丰富的政治统治经验，通过佐佐木到一这一渠道，给关东军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时隔一个月的同年3月，张焕相陪同张景惠访问朝鲜，有机会拜见举荐他的恩人原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现朝鲜总督南次郎，当面受到南次郎的夸奖和鼓舞。张焕相更来劲了，回来又向上提出建议，这第二次建议是8条。其中有关于鸦片的专买专卖，加强国防建设，管制关内流民，修建乡路，经营林业等，还特别提到农业的许多问题，诸如统管土地买卖，设立农业银行，发放农业贷款等，这也是他在抚顺新屯盘剥农民的经验之谈，很有实用价值，颇受日伪当局重视。

又过不久，在日寇伪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去东京办事之前，张焕相直接向这位当时伪满大管家上书建议。这是他第三次向日伪献计策，涉及范围更广，约有20余条。其中既有文教方面的，诸如小学是学校教育的基础，要重点抓好，提倡保存古迹，管好宗教，甚至提出规定全国服制以及妇女发样等；也有经济方面的，如兴修水利，奖励造林，资助开垦，整顿税收，扩大贸易，发展实业等；还有政治方面的，如整顿警务，考察吏治等；更为改进协和会工作提了不少意见，如限制一般协和会员发展，要发展有政治能力的人入会，以提高协和会声望与活动能力等等。

四、他只当上了“大臣”白做了“执政”梦

张焕相如此频频上书建议，尽力在日伪当局面前表现自己的政治见解与治事才能。事不过三，三次建议后，果然有反响，4月间即由协和会中央本部参与的闲职，改任中央本部委员，不到一个月，5月1日又改充中央本部企划部长。这时，他本想代表协和会中央本部参加黑龙江省协和会本部会议，没等动身，又来了通知，要他等待特任式。5月7日特任其为伪司法部大臣，终于如愿以偿，初步达到了回东北的目的。

在伪司法部大臣任内，他帮助日寇动用杀人的司法机器，残杀和拘禁了许多爱国人士，实行了法西斯高压统治，他也大摆官架，颐使气指，在伪司法界也算一霸。然而对于官瘾极大，又自恃老资格的张焕相，回东北来本以当“执政”为自己追求的政治目标，虽然实行了帝制，“执政”之位不可谋，但还可以降而求其次，“总理大臣”的位子还是值得坐一坐的。于是就又发生了种种媚日的丑闻：小到规定配属中国人当秘书官，他偏选用日本人充当，大到竟至带头修起了日本神社，平时常讲一句

口头禅：“日满一德一心，就是一日本之德为德，一日本之心为心。”经过这么一番对日亲善的表演，还真地博得了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好感，据说对他的使用，确实是在关东军上层人士间有过内部酝酿，结果因为他太老奸巨滑，刚愎自用，日寇感到不如张景惠好摆布，又因为他为人又硬又臭，以老资格自居，在汉奸中没有一点人望，加之年龄太大，不管他怎样取悦献媚，还是竞争不过后起的“旅大派”阎传綏。1942年9月，阎出任伪司法部大臣，张焕相只好改任伪参议这一闲职。他下台时，正值伪协和会开全国联合协议会，他仍然当伪大臣一样，要求以“特任官”的资格列席旁听，每天带着家里最善交际的大小姐张蕴英出入于会场内外，当时颇是引人注目。这一最后的表演，又博得了伪协和会系统的日本人的好感，说他“热心于五族协和”。为此，1943年春天，日本兴亚同盟本部在东京举办讲演会，伪满协和会就派张焕相作代表，在东京歌舞姬座与新民会、蒙疆自治会的代表，竞相发表讲演，鼓吹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以后又在南京等地进行过同样的演讲，成了所谓促进“兴亚运动”的积极分子。但总是人老珠黄，不管怎样刻意打扮，已在日本当局者眼中失去了最后价值。他的“执政”梦和“总理大臣”梦，始终是梦，而他带头修日本神社的丑行却成为留在伪满政坛上的笑柄，连老亲日派张景惠都表示反感，私下埋怨说：“若不叫张焕相修神社，哪能招来日本人修建神庙呢，全是让他闹的！”张景惠这话反映了汉奸们对张焕相的较为普遍的厌恶心理。若说修建国神庙，那也是日寇策划已久的阴谋，目的是把中国东北作为其从属国，进而统一祖先，统一宗教，达到同化的目的。早在建国不久，协和会就开始酝酿，植田谦吉司令官下台临走时还对溥仪说过，“日满亲善能在宗教上一致就好了。”张焕相率先修神社，只不过更坚定了关东军推行这一阴谋的决

心，所以尊他为“敬神家”，他也因此更沾沾自喜，不管别人的反映如何了。

张焕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奉行“流芳遗臭各千秋”的历史观，对世人的评说满不在乎。他曾写诗云：“如山铁案无轻重，似水流年任短长。”然而历史的裁决是无情的，铁案确实如山重，任凭谁也否认推翻不了的。张焕相以政治流氓的戏谑态度对待历史，到头来还得接受人民正义的审判，逃脱不了汉奸的恶名，这就是历史对他的惩罚。

（摘自《汉奸秘闻录》）

我心甘情愿地当了汉奸

阮振铎

1918年4月，我从南满医学堂（在沈阳日本站附属地内）毕业后，就在奉天满铁医院充当医员，给日本人服务。1920年又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做研究工作，就更深一层接受了日本的教育。因为和日本人接触了七八年之久，养成了崇日亲日思想，看不起祖国的一切，竟把日本的医学校完全看做能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材的地方，不明白日本的用意是要将中国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设立医学校，正是为推行这种政策的措施之一。由于我的崇日亲日思想较深，所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由给日本帝国主义者金井章次（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医学博士）作帮凶起，加入到伪政权。我和金井的结识，是从我在奉天公立医院当院长时（1923年--1929年），因1928年通辽一带发生鼠疫，为办防疫开始的。